论美国"新经济"的本质特征

沈大勇

摘要： 尽管从去年第4季度起，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减缓，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周期，但是各种迹象表明，美国"新经济"业已呈现出的深刻的演变趋势，不仅没有任何减弱，而且将在新世纪前期继续引领甚至主导世界经济。

关键词： 新的微观基础；新的市场定位；新的调控机制；新的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 F 1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2001)04－0001－04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中的界说，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具有以下四大特征：(1)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2)信息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3)新型服务产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着主要角色；(4)人的素质与技能是过渡到知识经济的先决条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该组织研究报告所描述的这一演变趋势，在发达国家经济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经济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典型则非美国莫属，不过美国的舆论界似乎更乐意将这一现象径直称为"新经济"。因为仅仅时隔一年，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就在该周刊上撰文认为，"新经济"是指一种以商业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他进而指出新经济具有下列表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利润持续递增；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猛增；失业率创新低；进出口总额大幅度上升；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此论一出，同样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新经济论普遍缺乏充分的经验数据或者严密的实证分析，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指出，美国经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革，而"新周期"看上去似乎更像老周期，只不过失业率低一点。支持者认为，美国可能或者已经开始进入新经济时代，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撰文分析周期变形问题，进而指出只要政策得当，美国经济就可以摆脱商业循环。虽说围绕着"新经济"的概念，仍有许多理论上的争执，但无论怎样，美国经济持续九年有余并且始终伴随低通胀的高速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在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稳定增长的经济，无疑是以新科技的研制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前提，代表着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信息化、知识化的趋势。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以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创造性开发为技术表征的话，那么，20世纪后半期在美国率先崛起的新经济，就是以知识与智力的历史性变革为其现代体制创新的内涵了。

一、新的微观基础

企业不仅是市场经营的主体，而且是经济学意义上组织创新活动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70 年代相继爆发的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使号称装在汽车轮子上的美国经济遭到空前的重创，曾一度陷于所谓“滞胀”的窘境。然而就是在这一资源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下，美国开始了新一轮艰辛而又漫长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美国的企业则在积极实施大规模、深层次的购并和重组。美国进入 80 年代后，无论是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还是一般的中小型厂商，都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产业组织方面的深刻变革。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公司的“股权革命”和企业的“工程再造”，而正是这种从技术领域到制度层面的系列创新业绩，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美国整个微观经济的现实基础。先来看公司的股权革命。传统的企业制度大多奉行产权归属原则和科层管理模式，资本家与劳动者可谓泾渭分明，然而由于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企业制度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为防止劳资间的这种矛盾激化，更是为着最大限度地调动被雇佣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英国和美国的公司制企业，相继推出一种员工持股与利润分享的计划。不过，这一参与持股从而分享利润的改革举措，还是以员工的货币资本投入为前提的。而美国所谓的股权革命，则是在此基础上率先推行人力资本的股权化或者期权化，并且逐渐形成一种收益相容股权激励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说，人本身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同样可以成功地转换为企业的股权，而这种知识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美国新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再来看企业的工程再造。所谓的工程再造，通常是指企业间的购并行为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调整。一方面，美国根据自身的资源战略优势，扩大或者缩小企业的规模，在海内外重组一批更具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公司。而另一方面，美国适应拓展全球市场的需要，在内部管理方面同样引入竞争机制，企业结构则由过去注重作业加工的橄榄型，转化成为既强调科研开发又突出市场营销的哑铃型。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企业普遍运用信息与网络的先进技术，进行规模空前的设备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成本，而且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绩效明显提高。

二、新的市场定位

在人们的印象中，美国似乎应该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其实不然。因为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美国政府一贯奉行凯恩斯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只不过到了里根政府时期，这种情况才稍有改观。然而，无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还是官方的经济学，却都依然推崇与时共进的“新凯恩斯主义”。毫无疑问，新凯恩斯主义在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对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进行了范围相当广泛的新综合，这种综合或许更加讲究理论的实用性。从里根经济学到克林顿经济学，虽说其政策主张的重点各有不同，但在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可谓殊途同归。也就是说，既反对过度干预的政府，又反对自由放任的政府，而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则不仅考虑经济总量平衡，并且注重产业结构调整，重新确立起市场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一方面，美国逐渐取消传统的对市场主体实施的各种管制，促使企业普遍增强市场竞争的意识和能力，而另一方面，则不断改革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方式，在大力规范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

市场。先来看规范国内市场。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其历史渊源来讲,无疑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海外扩张而逐步形成的,然而在经历大萧条之后,美国的市场调节力度,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拓展,却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保护。其中比较典型的政策调整,恐怕要数美国金融市场的立法改革。1933年,美国国会制定、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业务严格区别开来,金融市场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业经营管理。一直到1977年,美国才放宽对《证券法》的解释,允许商业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从事证券经纪业务。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最终允许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进入对方的传统领域参与公平竞争,这将对美国金融业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经营格局和管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而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则同充分有效的金融市场一样,改革并突破传统体制的樊篱,为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奠定基石。再来看开拓海外市场。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美国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并且先后与加拿大、墨西哥谈判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政策相应作出重大调整,由传统的自由贸易转向更为注重实力地位的所谓公平贸易,其核心是通过各种场合的谈判,要求贸易伙伴不断开放市场。克林顿政府为此制定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并确定六大重点出口产业,竭力倡导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其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特别是为美国重新主导全球经济的终极战略目标服务。

三、新的调控机制

新凯恩斯主义由于接受理性预期学派的批判,因此主张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具有前瞻性行为的厂商与消费者,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宏观经济学的重构。如果说,以前争论的焦点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谁更有效的话,那末现在的论战则集中于宏观经济政策本身是否切实有效了。不过,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似乎足以证明增减有序的财政政策与秉持中性的货币政策业已初见成效,因为至少进入90年代的后半期,美国几乎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先来看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众所周知,财政赤字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美国经济发展的顽症。尽管里根政府上台伊始,就采纳了供应管理学派的政策主张,将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作为其具体施政的主要措施,但由于军费开支的迅速膨胀而最终导致联邦政府的债台高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林顿政府则采取双管齐下的财政政策,即通过减税以刺激供给和通过节支以控制需求,并且同国会达成协议,计划用10年时间消灭财政赤字,从而实现预算平衡。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注重财政结构性调整的政策举措,不是一味地减少支出,而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有增有减。一方面,通过增减税收来鼓励私人投资、促进企业成长和引导传统经济转型,由此增加财政收入;而另一方面,则通过大力裁减联邦政府雇员,取消非生产性开支,制订福利改革法案,来全面削减政府的财政支出。1992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高达2 900亿美元,而1998年则实现了财政盈余690亿美元,这是30年以来联邦财政的首次平衡。当然,这种财政的改善与重建,除了政府适度的调控因素以外,还得归功于企业内在活力的普遍增强和国际竞争力的明显提高。毫无疑问,推行平衡的财政预算,有助于增强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促使长期利率降低,促进投资市场繁荣,也有利于增强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能力。再来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1987年,艾伦·格林斯潘接替保罗·

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然而 1996 年《财富》杂志的封面却刊出一句惊人之语：谁当美国总统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事实上，格林斯潘果然不负众望，坚决摈弃相机抉择的传统做法，谨慎地推行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稳定货币政策，使利率保持中性，即对经济既非刺激也不抑制，从而使经济能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并存的情形下保持稳定增长。因此，尽管格林斯潘对新经济同样秉持中性立场，但他反复强调防患于未然，并且灵活采取干预措施的本身，却无疑在为方兴未艾的美国新经济导向护航。

四、新的增长方式

众所周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是以传统的物质经济表现为其研究对象和立论基础的，因此推导出“资源稀缺原理”与“收益递减原理”。但是一场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悄然改变着这种经济法则，因为它不仅迅速扩大了人们获取和交换信息的机会，而且根本改善了人们加工和运用信息的能力。1990 年，美国对信息产业部门的投资总额，首次超出同年对其他行业的所有投资，因而被认为是美国开始进入信息社会的某种界碑，也就是说，信息继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后，业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力量。然而与物质或能量截然不同的是，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确实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禀赋，即信息资源的非稀缺性和可共享性，而这种特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增长方式。所谓知识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关于诀窍的知识，也就是人们通常指称的技术，而另一类则是关于属性的知识，也就是人们通常指称的信息。如果说这一科技的深刻内涵，在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还仅仅被计量为技术进步的余值的话，那末毫无疑问，在罗默的经济增长模式里则被集中表述为知识创新的源泉了。各种实践表明，专门有关技术的知识可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大量有关信息的知识，则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普遍提高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绩效。事实上至少在美国，经济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日益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的拓展格局，也就是说，知识正在逐渐取代劳动力和资本而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要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既包括创造财富的特殊能力，也涉及众多的科技专利和知识产权，因此，非但自身具有报酬递增的显著特征，而且还能够使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投入同样实现收益递增。此外，人们不难发现，信息资源比较容易突破时空的限制，一则凭借数字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渗透，再则凭借网络化技术对国际社会进行重点扩散，因而其在本质上似乎要求某种世界范围的配置效益。但是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经济学的理论困惑，例如微观经济的价格机制、消费模式和生产成本；宏观经济的整体均衡、增长周期和政府干预，因此人们期待着新经济时代即将诞生的亚当·斯密。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